

独自去面对经典

□梅新林 葛永海

“重读经典”这个话题的背景因为被设置在影像传播大行其道的今天,而使“重读”的内涵和性质发生很大改变。在当下的“重读经典”中,无论是阅读的主体、客体,还是背景、策略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所谓经典,指的是千百年民族文化智慧反复凝练、提纯而出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就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为什么读经典》)。一旦成为经典,就会自然进入一个开放的、具有超时间性的结构和流程当中,正是通过一次次重读,经典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识和生命形态,那些栖息在历史文本上高贵的灵魂才一次次被激活,悠远高妙的回声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空间里盘旋响应,其深刻意义和恒久魅力才不断获得验证。重读经典作为传承与激活民族文化精神的关键环节,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又具有时代的规律性。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消费主义为特色的时代,任何经典作为精神性的文化产品,事实上都不可能止步于传播,自弃于时代。若要传播,必有消费,传播过程也就是一个消费过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书籍出版,需要读者购买;各类媒体上的文化讲座开办,需要受众、需要眼球。在一个“眼球经济”一呼百应的时代,市场关注度反客为主地成为文化传播活动的主宰者。所以说,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经典是否要进入市场,而是要去感受市场的冷漠和铁律的无情,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市场,成为文化产品之后,我们如何秉持和高扬超越功利的文化理念,对于这种媒体和学者合谋的“经典代读”进行学理化的反思和明辨!

在文化消费背景下,“重读经典”的活动本身体现出复杂的特点,具有以下几重特征:

其一,影像化。重读经典的传播形式和场域发生变化,由传统的纸质传播一变而为以电视媒体的影像传播为主流。媒介文化的演变历经了从“口头”到“笔头”再到“镜头”的过程。而现在,则是“镜头”一家独大,统摄了“口头”和“笔头”的优势,通过联合口头优势和出版优势,将效应不断放大。“经典代读”影像化的优势在于直观快捷,通过强势媒体迅速抵达千家万户,也使民众趋之若鹜。而缺陷也至为明显,影像的动感超越了文字固有的静态特性,单向地提供感性直观的当下体验,却取消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契合时代注定是一个直观浅表、排斥深度的时代。

回到文学现场

傅汝新

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面临一些错综复杂的难点。当下文学观念的多元化,使“重估”既无法确定,也无法统一一个有效的标准。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讲,这当然是再自然,或者说再正确不过的了。在这种意义上讲,讨论者的冲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真实。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历史阶段相对而言成就比较高,一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另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第三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实验小说”。但怎么看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却因文学观念不同而结论完全相反。

比如说,我之所以比较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是从社会思潮的意义上,它为那个时代注入一种高昂的民族自由解放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精神,这批作品偷偷地伴我度过了“文革”那个精神荒芜与苦闷的年代,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当下文学所匮乏的。再谈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们关注着每一个重要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一部什么样的,让我们为之震撼的作品。在那几年里,可以说,整个时代都属于文学。如果说“五四”文学曾经创造了引领过社会向着光明前行的神话的话;那么,事隔半个多世纪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则复制了那个伟大的神话,它直接推动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时隔不久,这一神话便被它的制造者自行解构,之后出现的“实验小说”则将其彻底颠覆。这一文学过程本身便不证自明了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的差异与冲突。再者,判断视角的差异与错位所带来的冲突就更加难以弥合。当我们在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洋上筑起我们的血肉长城,而且还要再在时间上将明清以及更加遥远的历史从我们的文学中屏蔽,于是,莫言、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苏童、余华、王安忆在我们眼前才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文学才似乎有了一点存在的意味。问题是,书店里到处堆放着两千年筛选出来的中国文学经典,而且,我们虽然始终不太认可,但又不能不承认的“全球化”现实把中国当下的作家逼入了死角。大量的二十世纪优秀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令我们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我们对莫言、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苏童、余华、王安忆“崇敬”就如同那蔚蓝色的海洋上的血肉长城一样,瞬间便被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所吞没,即便还有些许的碎片漂浮于海面,但已经面目全非。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里,中国文学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那么,中国当代作家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新鲜独特的生存经验和精神思想呢?更不要说文学性层面的形式与技巧了吧?作为作家,我们甚至连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已经丧失,我们连精心描写人物对话的耐心都没有,甚至可以说已经不会写对话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脸面指责诺贝尔文学奖不发给中国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底气不虚心接受外国学者的批评?再回头看看我们的理论批评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究竟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理论与方法?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这几十年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能留下多少印迹呢?因为我所读到的所谓理论与批评都是西方的,没有,哪怕是一点点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接着,我听到一位在中国研究学习了多年的韩国女学者几乎相同的声音: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全是西方的,我真不知道我干嘛要到中国来学习西方的理论批评。陈晓明近来对这种现象也甚表忧虑: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略,就是我们当代文学的“重估”已经远离了当代文学发生的时代与场域,我们已经不再能感受那时的文学情感与体温。历史何以给后人以冷漠无情的感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治史者远离了历史现场,感受不到了那一时刻的情感与体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喜爱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我们当然,也是必须要回到当下,回到文学现场。近一个时期,对当下文学及作家的批评已经让我不忍心再在他们受伤的伤口上撒盐了。我觉得,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作家身上明显地有失公允。当整个社会都世俗化、商品化、娱乐化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也食人间烟火的作家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呢?许多作家为利益所裹挟是事实,但也是有一些为文学而生而死的作家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病毒已经侵蚀到人的精神与情感深处,多数的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世俗化、娱乐化,甚至商业化似乎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其二,大众化。重读经典作为当下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乃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或小群体的行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重读经典”群体化的积极意义在于当经典开始进入大部分民众的视野时,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至少形成了场面上的繁荣,构成了“群体化”的奇观。细究之下,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却显得错综复杂,普罗大众是在“学术明星”的“代读”下而被集结在一起,“学术明星”以学术号召大众,自身却被学术主流(有别于大众的小众)所抛弃,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一时代。尽管在中国历史上,经典的雅俗在很多时候并不截然可分,尽管一些文学经典如《水浒传》《西游记》本身就是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但是在大部分历史场域中,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发表见解的方式和场域基本界限清晰,泾渭分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精英团体的内江为出发点,使得精英团体与非精英团体,对于经典的评判出现了相互歧异的标准,学术主流与民意主流的观点被扭结在一起,难解难分。

其三,商业化。重读经典作为文化消费具有双重品格,既具精神性,更具商业性。一方面,这种传播活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消费的是经典,乃是文化传统中最富精神含量的部分。另一方面,究其本质,则是一种以文化、以经典相号召的商业活动。“重读经典”几乎被完全带入市营销的流程中,在强势电视媒体的主导下,遵循的主要是商业逻辑,它主张“受众为王”,因此其所选择的“学术明星”基本上口头技巧高于学术能力,经典阅读的形式被置于极高的地位,始终遵循文化传播中的“就低”原则,对带有趣味性的娱乐元素进行不遗余力的挖掘,强调语言表达的技巧,强调外在包装,有时甚至不惜以矮化、歪曲经典为代价。

其四,浅俗化。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理解经典,进而重释并重建经典,这是经典重读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我们相信,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有其恒定的精神传承和厚重的思想内

涵;另一方面,经典重读始终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其实质是一种当代性阅读。体现特定的时代背景,从而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当下的特异之处在于,当历史性智慧与当代人趣味扭结在一起时,媒体和学者无法摆脱电视媒体的某种先天局限性。于是,在媒体和学者的主导下,受众也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经典深层意涵的探询和追问,信息的不对称使受众面对经典之被肢解和扭曲而浑然不觉。所有人都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彼此以经典相号召,其实被浅化、通俗化后的经典已与本相相去甚远。可见,当重读经典的形式大于内容时,当重读经典被贴上时尚标签,几乎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的“狂欢仪式”时,已不大可能要求参与者去平心静气地体味和感悟经典的真意了。

对此,我们的关注和反思也就有了更多现实的紧迫性,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或者说,如何理清彼此纠结的矛盾?

第一,重新审视“重读经典”的出发点。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都应该正确处理社会使命和商业利益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公共媒体的前者,肩负着知识传播与文化消费的双重使命,知识传播比之文化消费更是任重道远,在文化娱乐沸反盈天、甚嚣尘上之际,公共媒体如何守住教育与娱乐的边界,显得尤为重要;而学者不仅承担着经典重释,而且还负有精神领航的责任,岂可为了名利,忘记历史使命,舍弃文化理想!

第二,深刻反思“重读经典”过程中“主导者”(媒体和学者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与受众的关系。到底是以传授者为中心,还是以受众为中心?以传授者为中心,就以新的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并通过个性化的重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大众共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提升受众群体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而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趣味,舍弃精神导师责任,淡化文化理想,降低学术含量,甚至曲意媚俗。

第三,准确把握经典内容的当代转化。作为经典的传播者必须明了经典内容中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与思想性(学术性、

严谨性)之间的界限,同时在推进经典民间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掌握这些分寸。到底是以趣味化、娱乐化的知识为中心,还是以具有学术性和严谨性的思想为中心?这是亟待“主导者”做出的选择,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景象则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比物理意义的娱乐圈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显然,在这个娱乐被“泛化”,被无穷放大的时代,我们凭什么来摆脱“娱乐至死”的魔咒?面对经典,除了我们强调并实践:“营养”比“口味”更有利健康,思想比知识更有益大脑,此外,别无他法。

第四,不断优化经典内容的传播方式。当下兴起的国学热潮乃是基于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和感悟,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情来回应这种热潮,应该在传播的方式、途径、载体上不断拓展和提升。用活泼灵动的方式不断拓展传播渠道,用视、图、文等多种形式优化经典内容的传播方式,使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民众都能够得到熏陶和教益。即便在经典的讲授传播之中,也鼓励讲授方式的创新性和多元化,强调探索性和启发性,反对模式化和单一化,使普通民众能够因讲授之“导”,而登其门庭,窥其堂奥。

第五,共同关注“重读经典”的落脚点。“代读”不是终极目标,只是大众化经典阅读的中间环节,只有回到公共图书馆,回到自读,才是回归“重读经典”的本来之义。大众群体的“自读”具有不可替代性。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养是通过无数个个体个性化的阅读、思考和智慧逐步累积而成的,只有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批判,才能够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创造力。

以纯粹消费的心态来对待重读经典,对于受众而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学会独自去面对经典,独立思考。正如波兹曼振聋发聩的提醒:“一个慈爱的教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娱乐至死》)我们始终相信,相比于影像,文字是更真实的存在;相比于代读,自读是更个性的存在;相比于知识,思想是更重要的存在!

为什么读经典

散文应是心灵的歌唱

我无意评说那些叙写世俗和历史文化的散文,但我始终认为,散文应是作者心灵的歌唱。最近读了作家迟子建的散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更强化了我的看法。

长期生活在北国大兴安岭的迟子建,看惯了从立春化到三月、四月,甚至五月的霜花和积雪。“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来自于作者洞察自己日常生活的直接环境生成的独特感受。“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又是作家迟子建多年创作经历的深刻内心体悟。你看,她1983年开始写作,14年后,陆续获得了三届“鲁迅文学奖”;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其间,顽强拼搏,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笔耕不辍,苦熬了25年。“苦熬出来的”,与其说是北极春天的精神存在,毋宁说是迟子建的生命咏叹。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更是具有悲悯情怀的迟子建对社会的热切关注。作家清楚地看到,当今社会存在“贪婪之气、虚荣之气和浮躁之气”。这篇散文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迟子建以隐喻的文学手法对急功近利社会的警示。真是古道热肠。迟子建的这篇精美散文,是作家生活、生命、思想交汇而成的心灵歌唱,流淌着她的心血,跳动着她生命的脉搏,给我们散文创作的启示应该是十分有益的。

高正东(黑龙江)

恶搞成语是对汉语的一种亵渎

“衣衣不舍”,“随心所欲”,“咳不容缓”……打开电视,类似这样的谐音“成语”铺天盖地。笔者认为,这种谐音“成语”是对成语的一种恶搞,是对我国语言文字的一种亵渎。

汉语成语是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是我国语言宝库中的瑰宝,也是汉语中的文字精华。它们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或来源于历史故事,或来源于民间谚语,或来源于神话传说,很多成语背后都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形式。但是如今一些商家为了广告宣传,肆意篡改和滥用成语,使谐音“成语”、“恶搞”成语“无处不在,这不仅是对汉语文字的一种亵渎,更容易对青少年造成混淆和误导,不利于汉语言的健康发展和青少年的学习成长。希望商家在宣传的同时,能考虑到谐音“成语”对社会的危害,正确使用传播成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商家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利益双赢的结果。也期待国家能够出台政策,遏制和杜绝这些篡改和滥用成语的现象,还青少年一个干净正确的学习环境。

刘剑飞(河南)

小小说与草根写作

《当代》杂志2010年第1期发出孙方友先生的《小镇人物四题》,由是产生了对小小说的一些想法。说到小小说,人们对这种文体的称呼很多,如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一袋烟小说等等,但不论怎么称呼,它都在形象地说明小小说“小”的特征。汪曾祺曾经在《小小说是什么》一文中指出:“短篇小说的一般素质,小小说是应该具备的。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本质上既相近,又有所区别。大体上讲,短篇小说散文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小小说则应有更多的诗的成分,小小说是短篇小说和诗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它不能有叙事诗那样的恢宏,也不如抒情诗有那样强的音乐性。它可以说是用散文写的比叙事诗更为空灵,较抒情诗更具情节性的那么一种东西。它又不是散文诗,因为它毕竟还是小说。”《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给小小说下的定义是:平民的艺术。他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俗)、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

的艺术形式。”说实话,我很赞赏这个定义。

在中国写小小说的人很多,因为这种文体的需求量很大,再加之这种文体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成就了一批“草根作家”的诞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生活在基层或者说一线,又有一份相对固定的职业,业余把写小说当成一种爱好,一种消遣,一种追求,也正是这批“草根作家”的诞生使小小说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更加繁荣。文学属于人民,好的文学就应该在平民中间。

如果说小小说是“草根”写作,阵地是地摊文学,我很乐意接受,谁愿意不屑一顾就让他不屑一顾去吧,当个“草根”,走“地摊文学”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一辈子,如果爱好写作,能把一种文体写好就足够了。

读者评论

郭震海(山西)

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乱点鸳鸯谱

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第三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其中不乏负面评价。剧中人物王大拿、王天来、陈艳南在第三部都找到了满意的人生归宿,而且对象都是来自国际大都市上海,这一点我也觉得不合理。

首先,咱们来说说王大拿和杨晓燕的爱情故事。王大拿是一位农民企业家,金项链金手铐金戒指戴得浑身叮当乱响,十足的粗俗暴发户形象。而杨晓燕则是上海一家大企业的副总经理,有学识有修养有品位,气质高雅。在事业巅峰期,做事干练,年轻而又精力充沛的她,有什么理由放弃自己的事业、放弃在国际大都市的家,嫁给一个和自己的价值观相去甚远,比自己大许多、形象也不怎么样的暴发户,定居在象牙山的屯子里。

王天来和李秋歌的爱情故事,更让人不可思议。王天来只不过是一位乡村医生,而李秋歌则是上海一家大企业派到象牙山的豆制品技术顾问。然而,剧中却出现了“女追男”的倒追现象,漂亮的上海姑娘李秋歌对带娘娘腔的东北农村小伙子王天来穷追不舍且百折回回。

陈艳南和白清明的爱情故事和以上两个也是同一个套路。陈艳南是象牙山的果园技术员,白清明曾留学英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擅长市场营销,他的事业也在上海,是单位派他出差到象牙山,帮助象牙山的豆制品打开市场。就因为陈艳南喜欢白清明,白清明就得留在象牙山的屯子里和陈艳南谈恋爱。

《乡村爱情故事》的乱点鸳鸯谱,不但荒唐,而且偏离了主题。让观众感觉,它体现的不再是乡村爱情而是都市爱情。

张立(河南)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laxin@sina.com,也可寄本报编辑部,信封上请注明“读者评论”字样

本版责编:周玉宁

洞察

中国诗歌

主编:阎志

| | |
|------|--|
| 名家新作 | 大风之韵(组诗).....叶延滨 |
| 本期头条 | 海岛之夜(组诗).....李少君 |
| 原创阵地 | 陆锦艳 苏历铭 邵永刚 李雨南 霜林晚 若水 刘淑荣 衣米一 荒原狼 王九城 古马 凹汉 徐源 沙织 司马 李元业 |
| 实力诗人 | 刘立云 孙晓杰 任长青 方文竹 牧风 黄晓聪 叶丽隽 林之云 费城 |
| 女性诗人 | 辽阔(组诗).....吕布布 |
| 探索频道 | 走进词的院子(组诗).....车延高 |
| 诗人档案 | 翟永明问答:我被迫经受各种考验 |
| 新诗诗论 | 冯至诗选 |
| 诗评诗论 | 谁在照料诗歌的田园.....殷实 |
| 天下文章 | “大风歌”与“核下歌”.....王文杰 |

| | |
|------|-----------------------|
| 名家新作 | 农历:一个人的节气(组诗).....韩作荣 |
|------|-----------------------|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
电话:027—61883208 投稿邮箱:zallsg@163.com 邮编:430312 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卓尔书吧

| |
|------------------------------|
| 2010年第三期(总第一百二十五期)目录 |
| 话题·关于文学的干净 |
| 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坐标.....周国平 |
| 一频道 |
| 我们还需要文学吗.....雷达 |
| 关于金人先生.....李建军 |
| 文坛忧思录(续).....陈歌耕 |
| 文坛掠影 |
| “小女子”迟子建向大作家迈进.....胡殷红 |
| 小说 |
| 澡堂子的故事(短篇).....梅驿 |
| 年年岁岁(短篇).....谭岩 |
| 醉扶归(中篇).....刘丽朵 |
| 开篇 |
| 对话:中国当下文学的基础理论...王彬等 |
| 博客工厂 |
| 中国诗歌地理·桂林篇 |
| 序与跋 |
| 序言三则.....汪政 |
| 黄河文讯 |
| 中华书局推出郭文斌《寻找安祥》 |
| 《黄河文学》2009年刊发诗歌作品陆陆续续入选各类年选本 |
| 《黄河文学》刊发作品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 |

黄河文学